

- 書評：*China and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Chen Shui-bian* [中國與臺灣：陳水扁執政下的兩岸關係] by Lijun Sheng [盛立軍] (London: Zed Books, 2003, Hardcover, 172 pp., ISBN 1842773186)

張顯超

國立中山大學

Dr. Sheng Lijun 在2002年經由東南亞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贊助出版 *China and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Chen Shui-bian* 一書。這是有關海峽兩岸關係發展演變的重要英文著作，有一定的份量與重要性。文中特別論及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政府上台執政之後的兩岸關係，具當前研究此一問題的前瞻性。此書對於兩岸關係變遷的重要資料蒐集相當的完整，且著重各項細節事實的發現，非屬於理論性探討的性質。對於任何中外政治學者要熟悉研究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相當的工具價值，是一本難得與嚴謹的兩岸關係英文著作。

本書特別的地方是，由於Dr. Sheng 是具備中國大陸的背景，因此對於中國大陸官方對台政策的掌握，是非常的細緻與精確。在其訪談大陸重要官方人士的發現中，也披露許多不為外界所知的兩岸密使事件。雖然前述事件真實性仍有待歷史研究證實，但就兩岸彼此政策脈絡發展經驗判斷，該書內容的可信度應該是相當接近實情。

張顯超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專長領域包括：國際經濟法、國際公法以及兩岸關係等。

Hsien-chao Ch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Chinese legal studies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 has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on topics such as cross-straits negotiations affairs, conflict of law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legal reform of the PRC after 1979.

論者認為，由於作者相當熟悉中國大陸官方對台決策背景的實情，因此對於台灣方面的政府官員與學者言，都應該有機會閱讀此書，可以深度瞭解中國大陸官方觀點的「台灣問題」。

但是，作為一個嚴肅的評論者，仍必須指陳本書仍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者反映的是一個相當接近北京觀點的「兩岸關係」，因此多少有失諸偏頗北京官方的味道。在學術上的價值上，由於較傾向歷史文件記述性質，缺乏對兩岸深入的政治學理或結構性分析，這是本書內容較為不足的地方。

作者認為兩岸關係轉壞的主因，是因為台灣歷任領導人的「錯失歷史機遇」（蔣經國）、「背信」與「台獨」（李登輝與陳水扁），且基本上是台灣方面的政治錯誤。此一看法，論者認為有失於客觀，而且刻意忽視中共對台灣政治打壓與台灣民主化轉變後的政治現實，作者的說法是與北京官方一致的。

解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時，作者忽略當時中共官方以同意協商「一個中國」作為事務性談判前提，最後卻因為香港文書驗證談判時，中方在落實書面文字上有顧慮，反而錯失雙方達成共識的機會。因此，如果說當時雙方並沒有真正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也是一種反向解讀。

作者認為李前總統提出「兩國論」的原因是：試圖影響2000年總統大選，以及拖美國下水造成美中衝突。此一說法是過度解讀外部影響而忽略李前總統內在動機的考量（作者是大陸學者，難免以反對台灣主權獨立為出發點，因此負面解讀李前總統與陳總統）。依照論者的看法，宣示確立中華民國（台灣）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可能是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主張背後真正的政治與法律意圖。而且可以歸納為具有下列多重的政治性目的：一、確立後李登輝時代兩岸關係的政治框架。二、以「兩國論」設立兩岸政治談判對等地位。三、以「兩國論」確立臺灣人民國家主體意識建立。四、以「兩國論」調整兩岸關係朝向和平與安全的發展。

作者對於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之後的民主蛻變，以及台灣在民主國家之

林的戰略地位轉變，缺乏任何分析與說明。只是認為美國的權謀作用，導致台灣問題成爲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敏感問題。這樣的看法，多少窄化了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佈局，以及輕視全球民主對於美國的立國精神與國際戰略作用。因此，對於美國支持陳水扁總統的執政也缺乏原因上的認識。

〈李登輝與「兩國」論〉(Lee Teng-hui and the “Two-States” Theory) 一章對於中共對台的談判與多次密使事件，有非常豐富的解讀，這是本章的精彩之處。另外，在談到1993年辜汪會談後兩岸關係轉壞的原因時，作者在文字上傾向於認定，是李前總統刻意讓兩會事務性會談與兩岸關係破裂，破裂的責任與北京當局沒有關係。依論者的觀察，台灣方面當時有意放緩兩岸兩會關係的進展速度，或許是正確的陳述。但是必須指明的是，台灣的顧慮之一，是在於兩岸兩會的交往並未改變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政治態度，中共並不願意以平等的政治地位對待台灣，特別是在兩會有關法律管轄權爭議的問題，大陸方面採取迴避的態度。在兩會談判失去雙方的期待性之後，拖延談判或是關係轉壞，應該也不是台灣方面的單方責任。

〈陳水扁總統執政下的臺灣〉(Taiwan Und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一章對於陳總統2000年後執政的大陸政策有具體描述，但是作者強調台灣領導人在兩岸關係上的反覆。無論是蔣經國時代、李登輝時代與陳水扁執政時期，中國大陸官方的善意，都一再得不到歷任台灣領導人的回報。而且其傾向於認定，是由於台灣領導人的背信，造成彼此在兩岸關係的毀損。就論者的觀點，作者前述的解讀是不完整與失真的，其在此章援引的資料，都是大陸方面的片面聲明，失去兩岸關係報導上的平衡。以學術的論點，建議作者實應由兩岸關係政治結構的切入點詮釋此一現象，或者深入究及兩岸未能建立互信的深層原因。

以論者的觀點，在地緣政治結構上小國要生存，拖延、彈性、妥協，甚至是背離承諾，都是必然的國家性格。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等歷任台灣的總統，都背負台灣國家安危與民意等壓力。而當台灣走向民主化之後，對國家主

權意識的覺醒，也並非台灣任何領導人的認知或意志所得以逆轉。甚者，中共當局對於台灣的統戰與政治包圍、在兩岸主權問題缺乏真正善意，也讓台灣的政府與人民缺乏真正的選擇。對抗、妥協與矛盾的三部曲，本來就存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動的必然過程裏。作者在此一議題上完全缺乏台灣觀點，是有相當的缺陷。

作者來自無真正民主選舉的中國大陸，因此對於台灣競選時的政治語言與執政後的兩岸政策難以區隔。其實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除了因為自己的選民基礎結構不同，有不同政治選舉語言外，其實對中國大陸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本質是相同，而且是短期內不會改變的。畢竟兩岸關係的敵性作用，特別是中共以消滅中華民國國家存在，與壓迫台灣國際空間的作法，都是讓台灣的全體人民與各政黨領袖沒有選擇，而且是不可能真正相信一個極權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會信守任何的政治承諾。

在陳水扁總統執政之後，北京當局一直不願意民進黨為談判對手，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作者並未深究其原因。其實北京的盤算是：根本不喜歡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不願意為陳水扁總統的執政加分、認為三通的籌碼在北京、認為國民黨有機會在2004年取回執政權，甚至認為採取兩岸關係倒退的作法，可以對民進黨構成強大政治壓力。因此，陳水扁總統的「四不一沒有」、「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統合論」、「修正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甚至是違背民進黨黨意的「大膽講話」，都被中共官方採取相應不理的態度。中共官方對民進黨總是有極深的戒懼與偏見。因此若說民進黨沒有善意，倒不如說中國大陸官方根本不可能，也不會信任民進黨。

〈中國回應〉(China Responds) 一章作者認為，中共當局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就是「等待」，而時間的優勢站在中國大陸這一邊。因此，中共當局對於台灣問題現階段的作法，就是加強對台灣持續性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等各層面的壓力，而且認為台灣的內部脆弱性，終會讓台灣毫無選擇的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要求讓步。作者甚至認為台灣的民主是有極大缺陷與致命的。論者對

於此一看法難以認同，主要的理由在於，台灣的民主轉型在亞洲，甚至是其他開發中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可以說是最為平順的。就政黨輪替而言，也沒有亞洲其他國家可以如同台灣一樣，非常的穩定且不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安。或者說，即使台灣現在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治爭議，但是自2000至2003年其間，台灣內部並未出現嚴重的社會動盪事件，一切的風暴也僅止於高層政治圈內。在此一時期的台灣社會其實是相對穩定的，或至少相較於政黨輪替後的南韓與菲律賓是如此。爭議是民主過程的必經現象，作者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過於負面。其實台灣的公民社會基礎，在基本面上是相當的健康。而且台灣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也是隨著地方制度三法的推進，逐漸的日趨成熟。真正要擔心的，反而是貧富差距嚴重的中國社會，這會讓中國社會的民主發展，帶來非常嚴酷的考驗。

作者認為，台灣的軍隊在政黨輪替後不穩，不認同民進黨。論者認為，台灣的軍隊在政黨輪替之後，更有機會走向中立與專業化的方向。台灣在民主多元化之後，國家認同與政治價值的多元是必然的，而不同的多元聲音，並不代表台灣的政治或社會一定趨向於不穩定狀態。論者認為作者在此章對台灣發展的認知，是相當的不完整。

在結論一章中，作者一再指陳台灣喪失與中國大陸和解的機會，而且認為台灣的政治籌碼在流失，處於相對不利的談判地位，這是台灣的損失。如果這是中共官方的語言，那無所謂真假對錯，反正是中國大陸的對外政令宣導。但是如果是在學術意義上就有待於商榷。至少論者認為，兩岸都必須為和解的失敗負責，或者是兩岸和解的時機根本從未真正存在過：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為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都蒙上陰影，1980至1988年大陸的經濟狀況面臨嚴重景氣循環、過熱的現象，前蘇聯在1991年的崩潰，更讓全球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前景不表樂觀。因此，在前述時期，海峽兩岸間統合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基礎，根本一點都不存在。

1993至1995年的辜汪會談時期，雖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帶來難得的和平機

遇。但是兩岸在主權問題上仍是無解，中共在兩會談判的管轄權爭議不願意讓步。以及兩岸兩會關係惡化後，中共對台灣在國際政治的全方位打壓，甚至是1995年以後的對台軍事演習與戰爭部署，雙方都不可能真正有真正商談的空間。

再者，中共真正要的是「統一台灣」。台灣的領導人、朝野黨派，以及台灣的人民都對北京的「善意」缺乏信賴感。而中共對台政策的操作，以及相關內部文件的披露，都明白指向以兩岸交流與談判，達到「和平解放台灣」的政治目的。中共官方對於兩岸以「邦聯」模式統一、「一中屋頂」等理論都缺乏善意，甚至連政治敷衍都不願意。任何涉及主權妥協的方案，中共官方也不可能接受。因此，兩岸連談的機會都未曾真正存在過。

在目前北京的算計，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必然造成強大的政治優勢，因此北京更缺乏對台讓步的理由。以大國心態來看待兩岸關係，更是造成兩岸關係和解無望。2000年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執政以後，其實北京當局對開啓兩岸談判的意願也是非常低。

雖然台灣當前是面臨北京更為強大的政治壓力，政治的選擇對台灣而言，或許是困難的。但是兩岸時間的優勢，真正是在北京當局一方嗎？情況也是未必然如此。